

毛泽东

孟醒◎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MAO  
ZEDONG  
ZAI 50 NIANDAI

在50年代

毛泽东 在50年代  
MAO ZEDONG  
ZAI 50NIANDAI

孟醒◎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 孟醒 2016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毛泽东在50年代 / 孟醒著. —3版.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7.1

(红年轮书系)

ISBN 978-7-205-08796-8

I. ①毛… II. ①孟… III. ①毛泽东 (1893-1976)  
—生平事迹 IV. ①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 274887 号

---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23284321 (邮 购) 024-23284324 (发行部)

传真: 024-23284191 (发行部) 024-23284304 (办公室)

<http://www.lnpph.com.cn>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幅面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张: 24.5

字 数: 400千字

出版时间: 2017年1月第3版

印刷时间: 2017年1月第3次印刷

责任编辑: 张 放 娄 瓴

封面设计: 今亮后声

责任校对: 吴艳杰

书 号: ISBN 978-7-205-08796-8

---

定 价: 55.00元

# Contents 目录

## 1948—1949年 开国的民主气象

新中国的建立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而这一事件的领头人就是毛泽东。因此，从这一点上来说，毛泽东就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世纪伟人。

毛泽东为什么要修改“五一口号” / 002

谁能参加新政协？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 005

新政协形成八个民主党派格局的历史渊源 / 015

从对待民主人士的态度看毛泽东的胸襟 / 018

《共同纲领》的颁布为新中国带来蓬勃的新气象 / 023

开国大典前的盛宴，毛泽东有敬必饮 / 028

“不速之客”对开国大典的绝版记录 / 030

## 1947—1957年 中苏同盟，毛、周互相配合，纵横捭阖

中苏关系是20世纪大国关系中的最重要方面，而中苏结盟则是撬动大国关系转圆的关键点。这个关键点的核心又是毛泽东所说的“一边倒”。东西方关系的对抗也好，缓和也罢，都能在这里找到一个侧面的解答。

斯大林为何多次拒绝毛泽东访苏 / 036

在中苏谈判中，毛、周二各展所长 / 044

出兵朝鲜，战略意义大于正义需求 / 051

赫鲁晓夫的中国“蜜月”与中苏反目的缘由 / 068

## **1949—1953年 从新区土改看毛泽东的战略思想**

新中国成立时，中共已在约有1.19亿农业人口的老解放区（总人口约有1.34亿）基本上完成了土改，尚有约2.9亿农业人口的新解放区（总人口3.36亿）需要土改。

针对要不要动富农的土地，有各种不同的态度 / 080

土改政策背后不为人知的密集调研 / 087

听取各方意见，《土地改革法》的制定过程堪称新中国民主决策的范例 / 093

广东土改节奏慢，毛泽东直接批评了叶剑英和方方 / 107

## **1950—1951年 毛泽东对“镇反”的时机选择**

新中国成立初期，除了一些地区尚有未肃清的土匪以外，许多地区尤其是新解放区的特务、反动派的破坏活动经常发生。可以说，那个时候的整个中国大陆并不像今天人们想象的那么太平。

反革命破坏活动猖獗，毛泽东的“镇反”举动却相对温和 / 116

“镇反”的“千载一时之机” / 126

“一贯道”等会道门组织的徒众越来越多，其中有不少是基层党政人员。这引起了地方党政干部的严重不安 / 130

从“北京经验”开始，“镇反”扩大化了 / 133

“镇反”扩大，毛泽东紧急部署收缩 / 138

## **1949—1952年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反腐思想**

1949年11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第一任纪委书记是朱德。

1950年4月，毛泽东指出：整训干部已经成了极端迫切的任务。

“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 146

增产节约运动与“三反”运动相互交织，同时登场 / 151

“三反”与“镇反”同时进行，“老虎”与“蚊子”一起打 / 156

“三反”运动从多个层面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程 / 175

## **1948—1959年 毛泽东与干部任用、干部待遇问题**

在国共进行战略总决战前夕的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

南下干部大军，实际上是由南下工作团和南下干部大队两部分混合编队组成的 / 182

大行政区与军事战略区中的“山头”是客观存在 / 186

不为人熟知的“干部审查”运动 / 191

毛泽东在干部待遇问题上的思考，供给制还是工资制 / 195

## **1947—1958年 毛泽东与新税制前后党政关系的调整**

中共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时期，通常是由中共地方组织以及游击队等武装力量代行政权事务。及至抗战中，建立了陕甘宁边区这样相对稳定的根据地，所实行的也是党的“一元化”领导，即党组织统领根据地军、政、民各系统，也就是说，党务机构承揽了政权（政府机构）的许多功能。例如，组织部掌管除军队以外的党、政、群各类干部事务，宣传部则掌管根据地文化、教育、出版、新闻等事务。同时存在的南方游击区，仍然是农村根据地的治理模式。

财政领导机构的历史变迁 / 208

党政分开的尝试只是昙花一现 / 212

被人们忽视却起着决定作用的党组 / 217

仓促出台的新税制遭诟病 / 221

新税制背后的矛盾根源 / 225

党务机构的行政职能被强化 / 231

毛泽东点名批评周恩来 / 234

党政“一元化”领导的形成 / 241

## **1953—1956年 “一化三改”与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

“一化三改”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核心内容。

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毛泽东从1952年就开始了思考。其后，经过近一年

的讨论酝酿，到1953年6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时，基本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以后又经过中央多次开会讨论，以及对有关文件进行修改并补充，到12月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表述。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共有18年时间。我们准备在这个时间内，实现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 / 246

“一化三改”奠定了发展的基础，也奠定了后来改革开放的基础 / 249

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争论 / 253

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既有成绩又有问题 / 261

手工业改造的历程 / 272

## **1956—1957年 “多事之秋”与“五七风云”**

---

1956年初的“三大改造”宣告完成，让毛泽东心情大好。许多开放的举措以及宽松的言论接二连三地出现。

毛泽东的初衷是要开创一个“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 282

对社会主要矛盾的不同判断 / 284

毛泽东要整风，党内不积极 / 288

当毛泽东看出党内整风有阻力的时候，就提出了党外整风 / 295

毛泽东“引蛇出洞”并不是计划好的 / 301

毛泽东觉得形势危急 / 305

“反右”扩大化的原因何在 / 309



## 1953—1959年 从合作化到公社化的深层考量

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从农业合作化直接脱胎而来。但农村的合作组织并不自新中国成立后始，早在民国初年就出现了信用合作（平民银行）、消费公社。

毛泽东要彻底解决中国历史的治乱循环 / 316

农业合作化要为工业化奠定基础 / 319

为什么要搞统购统销 / 324

“抢粮”与“退社” / 327

风波之后的调整 / 331

毛泽东对“公社化”的考量 / 333

毛泽东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 / 341

“人民公社好”是毛泽东的原话吗 / 348

## 1957—1959年 “大跃进”发生的多重原因及多领域“大跃进”

1958年5月26日至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大跃进”运动的发端。而“跃进”一词的发明权却应该归属于周恩来。

“跃进”一词的发明权属谁 / 354

毛泽东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 / 358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目的何在 / 364

从农业到工业的跃进 / 368

值得记取的各领域“大跃进” / 372

1948—1949年

## 开国的民主气象

---

新中国的建立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而这一事件的领头人就是毛泽东。因此，从这一点上来说，毛泽东就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世纪伟人。

1949年3月下旬，毛泽东从西柏坡“进京赶考”，开始谋划开国仪式。但毛泽东最初并没有进城，而是先在香山住了三个月。当时在香山的中央机关对外称“劳动大学”。据说，毛泽东曾拒绝住进中南海，说那是皇帝住的地方，“我不当皇帝”。实际上，在民国有一段时间，中南海还是人人可进的公园呢。

当时，中共中央召开各种会议以及毛泽东接见民主人士都在香山。

几个月后，毛泽东因为事务繁忙，从香山到城里两头跑，不仅牵扯极大的警卫力量，而且太过辛苦，最后还是在周恩来的建议下，搬进了中南海。

这个时候，新政协筹备会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 毛泽东为什么要修改“五一口号”

早在1948年9月的时候，在最早解放的东北，就曾经准备成立新政协，还要宣布建立新中国。民主党派的领袖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已经从香港秘密抵达哈尔滨。他们是在中国共产党发出“五一口号”后，最积极的响应者。毛泽东当年在修改“五一口号”时，加上了这么一句话：“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与先期抵达哈尔滨的民主党派领袖就召开新政协的协议草案进行了交流与修订，达成初步意见后，又将之向滞留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周新民、马叙伦、陈其尤、李章达、沈志远、彭泽民、章乃器、孙起孟、郭沫若等重量级人物征求意见，1948年11月25日达成《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该协议规定了新政协的性质、任务及人选：“新政协参加范围，由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组成，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得许其参加。”

1948年11月29日，也就是《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正式公布仅仅4天后，平津战役（国民党称之为平津会战）也打响了。而在这一年的11月6日，淮海战役（国民党称之为徐蚌会战）也开始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发出不久，李济深、何香凝、郭沫若等四十余人分三批先后到达东北的哈尔滨，只等全部人员聚齐就可以

开会了。新政协还在筹备之中，淮海战役在1949年1月10日、平津战役在1月31日就先后胜利了。中共中央随之决定，将新政协会议改到北平，新国家的首都也定在北平。

据记载，1949年6月16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六个工作小组，每个小组都承担不同的任务，分别开展工作，但组员有交叉。

第一小组的任务是拟定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各单位的代表名额、名单。该组的组长和副组长，分别由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李维汉（中国共产党代表）和常务委员章伯钧（中国民主同盟代表）担任。组员有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马叙伦、彭泽民、曹孟君、谭平山、蔡廷锴、陈其尤、聂荣臻、李立三、朱富胜、陈叔通、曾昭抡、许德珩、冯文彬、蔡畅、黄振声（黄鹤禛代）、罗叔章、天宝、陈其瑗等22人。

第二小组的任务是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即后来公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该组的组长和副组长，分别由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谭平山（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代表）和副秘书长周新民（中国民主同盟代表）担任。组员有林伯渠、李德全、施复亮（孙起孟代）、符定一、王绍鏊、郭冠杰、史良（张曼筠代）、郭春涛（吴茂荪代）、蒋光鼐（秦元邦代）、雷荣珂、易礼容、郑振铎、俞寰澄（酆云鹤代）、叶圣陶、沈兹九、李秀真、陈震中（葛志成代）、天宝、戴子良。

第三小组的任务是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该组的组长和副组长，分别由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周恩来（中国共产党代表）和民主教授代表许德珩担任。组员有陈劭先、章伯钧、章乃器、李达、许广平、季方（严信民代）、沈志远、许宝驹、陈此生、黄鼎臣、彭德怀（罗瑞卿代）、朱学范、张晔、李烛尘、侯外庐、邓初民、廖承志、邓颖超、谢邦定、周建人、杨静仁、费振东、罗隆基。

第四小组的任务是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即后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该组的组长和副组长，分别由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和中国民主建国会代表、筹备会常务委员黄炎培（不

在北平时由张奚若代)担任。组员有张文、沈钧儒、张东荪、胡厥文(阎宝航代)、林砺儒、林汉达、韩兆鹗、李章达(千家驹代)、王昆仑、李民欣、陈其尤、刘伯承(滕代远代)、丘金、石振明、俞寰澄(酆云鹤代)、张志让、谢雪红、张琴秋(不在北平时由沈兹九代)、聂维庆、汤桂芬(雷洁琼代)、朱德海、罗隆基。

第五小组的任务是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大会宣言(即后来公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该组的组长和副组长,分别由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陈劭先担任。组员有梅龚彬(吕集义代)、楚图南、吴耀宗、丘哲、胡愈之、陈铭枢、蒋光鼐(秦元邦代)、黄鼎臣、杨耕田、李烛尘、洪深、胡乔木、邓裕志、乌兰夫(奎璧代)。

第六小组的任务是拟定国旗、国徽和国歌方案。该组的组长和副组长由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指定,组长由筹备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代表马叙伦担任,副组长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叶剑英和筹备会常务委员、文化界民主人士代表沈雁冰担任。组员有张奚若、田汉、马寅初、郑振铎、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张澜(刘王立明代)、陈嘉庚、欧阳予倩、廖承志。后又聘请徐悲鸿、梁思成、艾青为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顾问,聘请马思聪、吕驥、贺绿汀、姚锦新为国歌词谱评选委员会顾问。

## 谁能参加新政协？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第一小组的工作因为牵扯到人事问题，最为复杂。

当时，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一共收到30份团体和个人要求参加新政协的书面请求。

最后参加会议的有14个党派单位，除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外，尚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三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建国会（民建）、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11个党派。无党派人士是作为一个派别位列党派之中的。

有两个党派并没有申请参加新政协，但被安排与会了，这就是以许德珩为首的九三学社与以谢雪红为首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九三学社是一个以大学教授为主的政治性学术团体，虽有政治主张但无政治纲领；台盟的成员均为台籍反国民党人士，其创始人谢雪红则是台湾共产党的创始人。

此外，一些要求参加新政协的党派，如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民社党革新派、中国少年劳动党、光复会、中国农民党等，以“组织不纯”“成分复杂”等理由被拒绝参会。

孙文主义革命同盟简称“孙盟”，它是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政治派别，其前身是中国农工社会党。1944年的时候，国民党内一部分反蒋分

子私下举办座谈会，随后形成了两个党内小团体，即农工社和大众社。但到1945年，他们在国民党党务部门的逼迫下，不得不自行解体。1947年，主张国内和平的这两个派别，因为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内战涂炭生灵，重组为中国农工社会党。这一派别的构成主要有三部分人。第一部分是曾参加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一些人，如许闻天等；第二部分是曾参加邓演达为首的第三党的一些成员，如邓昊明等；第三部分是从蒋介石集团中分化出来的一些高级军政人员，如贺耀祖、陈惕庐等。该党虽然没有被接受为参加新政协的一个党派，但这三部分的代表人物都以个人身份参加了新政协。当时，因为该党的主张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主张重合度较高，其成立后不久，就派出人员到香港同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联系，要求作为民革的一部分。对此，朱蕴山代表民革表示了欢迎，但要求他们更改党的名称。1948年春，中国农工社会党改名为孙文主义革命同盟之后，最终并未合并进民革。孙盟在中共中央1948年发布“五一口号”前，也曾派人到苏北联系中共党组织，之后又派人到香港同中共在港负责人取得联系。其领导层确有个别共产党员。但对于中共的“五一口号”，孙盟只在口头上表示响应，并没有发表公开声明。第一小组认为，孙盟虽有部分民主人士，对中国革命也做出过有益的贡献，甚至有些人还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但其组织不纯，成分复杂，不宜作为一个派别参加新政协。若有必要，可以邀请其个别代表人物参加。6月19日，李维汉在新政协筹备会全体会议上作《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草案）》的说明时，公开了第一小组的意见，并被大会接受。

7月，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许闻天来北平面谈孙盟参与新政协事。

当时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就是李维汉，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居于领导地位。

许闻天到北平后，提交了《孙文主义革命同盟工作节略》的简要报告。除介绍孙盟的组织经过和活动情况之外，并表示如孙盟无继续存在的必要，可考虑立即解散，但他希望中共能给予该盟同志以精神上的安慰。就此，李维汉同许闻天有了一次直接面谈，在建议孙盟自行结束的同时，提出其成员

可以以个人身份参加民革。许闻天表示同意。随后，孙盟中央及一些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在上海开会讨论了中共中央的建议，会议同意结束孙盟的活动。8月2日，孙盟在上海宣告解散。当时，新华社还播发了相关消息。

1949年9月下旬，许闻天、邓昊明以个人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很大一部分人转入了民革。

民社党革新派的全称是革新中国民主社会党。1946年11月，民社党党首张君勱等决定该党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并参加国民政府，导致内部分裂，一部分人离开组成了民社党革新派。1947年8月15日，民社党革新派在上海宣告成立，伍宪子任主席，沙彦楷为副主席。这些人的成分更加复杂，仅从其负责人来说，有的是英美派，还有军统分子和中统分子。从立场来说，有的既反蒋又反共，主张走第三条道路。反蒋的民主人士也有，但属于极少数，如沙彦楷、汪世铭等。

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后，民社党革新派本身又发生了分化。沙彦楷、汪世铭等以民社党革新派的名义公开发表文告，表示予以响应。1948年8月，因为政见不同，孙宝刚、罗坚白等被开除。该组织的主席伍宪子也随即宣布辞去主席之职，副主席沙彦楷任代理主席。1948年12月，该组织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宣称这一派别“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及生产劳动大众利益”，主张“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推翻以地主、买办及贪污腐化集团为基础的南京反动政府，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该党派的目标与中国共产党的目标虽有小的差异，但大的方向是一致的。因此，在1949年6月中旬，汪世铭离开香港来到北平也就不奇怪了。在北平，汪世铭经李济深、章伯钧、陈叔通等致函周恩来和李维汉，并转交了《民主社会党党内斗争经过》和《告全党同志书》，提出要参加新政协。第一小组认真研究后提出，该党派最初成立时，成分就极其复杂，近几年又几经分裂，虽然民主分子在其中一直是中坚分子，但整体来说，仍不宜作为一个单位参加新政协，其个别民主分子可以个人身份参加新政协。这个意见被新政协筹备会接受。

6月27日，李维汉与汪世铭直接会面，传达了以上意见，并建议他们的



组织应考虑自行结束。除该组织中的民主人士代表人物由新政协筹备会邀请其以个人身份参会之外，另外的民主分子，在与民盟协商后，可以加入民盟。一些该组织内被错认为反动分子的人，可提出名单以助解决。汪世铭最后表示同意，并说已函告本组织暂停活动。

这次谈话后不久，以民社党革新派名义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被发现。这份文件对未被以党派邀请参加新政协表示了强烈不满。中共中央统战部就此询问了该组织的头面人物汪世铭、沙彦楷，这两人表示事先确不知情，并表示愿公开发文驳斥，相关事务由他们自行处置。

1949年9月，民社党革新派决定自行解散。其原来的领导人沙彦楷、汪世铭由新政协筹备会特邀以个人身份参加新政协。

汪世铭曾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说明了该组织成立以及解散的原因。他说：“三年前因为张君勱及其走狗们破坏旧的政协，破坏民主统一战线，厚颜无耻地参加了伪国大，参加了伪政府，为蒋介石反动政权帮凶”，“我们党内忠于民主与和平的同志们表示万分的愤慨，不能不起来反对他、打击他，所以才有革新的民主社会党的组织”，“但是我们内部存在着许多缺点，例如组织不健全，分子复杂，又没有严格的纪律，往往发生错误的言论与行动，招致恶劣的影响”。

另一个没有参加新政协的党派组织是中国少年劳动党。中国少年劳动党1945年成立于重庆，其负责人是安若定。安若定早年即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1923年在上海大学组织孤星社，任社长兼总编辑，出版有《孤星》旬刊，来宣传三民主义。学术色彩浓重。陆续加入该组织的有中国合作经济研究会、中国崇实学社、中国幼幼协进会、中国文化协会、中国乡村建设协会、中国民族素质改进会及国术研究会等学术组织，另有一些佛教人员和国民党人员加入。

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口号”后，中国少年劳动党曾积极响应。1949年5月，在上海解放前夕，该党曾一度帮助中共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策反工作。几乎同时，该组织的安若定等人到北平积极活动，要求少年劳动党以党派身份参加新政协。为此，李维汉两次会见安若定。鉴于该党没有明确